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七期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1d)

【百家争鸣】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	阎长贵
【史实探索】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	余汝信
【文革探索】	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下）	卜伟华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一）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百家争鸣】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

• 阎长贵 •

余汝信先生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一文中明确论定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除引用了一些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了关锋本人2002年5月13日致友人信。关锋在这封信中说：“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进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

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做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7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

余先生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而对关锋这封信我有点狐疑。不知道关锋为什么这样说？真的是实话实说，还是有什么隐情？

对于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这件事，余先生所说和关锋本人所说，与我曾有过的经历和印象不同。我的印象是：有任命，但他未到职。

文革中和文革后我都问过关锋这件事。文革中，关锋跟我说：去当总政副主任，我能力不行，更重要的萧华是主任，在过去他曾是我的上级，我对他印象不错，去了不好开展工作。文革后，我问他，总政副主任你没到职，是不是主席不同意你去？他说：“不！”主席说了：“我宁可不要《红旗》，也要军队。”

1967年夏天，戚本禹要我问问江青：“关锋为什么还不到总政任职？”当我问江青时，她告诉我：“总政去不得，总政是个烂摊子，去了就拔不出来了。”我把江青这个答复告戚，并认为这是江青保护关锋。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不止一次地说：

“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1966年末或1967年初，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值班室看到一个文件，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文单位好像是军委或总政治部，可能是在同一文件中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关锋排在几位副主任的中间位置。

“看到这个文件后，我去钓鱼台十五楼办什么事，和关锋谈完了，顺便我就问他，现在任命你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下来了，你该去到任啊！是不是应该在总政先设个办公室处理一些军队方面的问题，像文件、电报、信件之类总要专人处理啊！关锋显然已经知道对他的任命，便说：‘是啊！可在总政设办公室，没有合适的人啊！我这里只有小瞿（指瞿怀明，关锋的秘书）一个人，他离不开，怎么办啊？看看再说吧！’

“关锋没有提出让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安排在总政治部值班的秘书。后来，关锋没有再提这个事，我也没再问。”

王广宇还说，我记得当时办公室收到有关军队方面的文件都要送关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议论，关锋衣帽不整，没点军人的样子，怎么能到总政任职啊？！

——关锋确实不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

关锋致友人信中讲“……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到解放军报社去过。”王广宇说这也不是事实。我亲自经历过的就有一次。1967年1月中旬或下旬，某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解放

军报，陈伯达就是派关锋去处理的，我和矫玉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瞿怀明陪着他去。关锋到解放军报后，动员和劝说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退出解放军报，有人不听劝，坚决不退出，很猖狂，他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场商量决定抓了几个带头的人，关锋怎么连这件事也没有记忆呢？

余先生举王力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先后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做根据。王力究竟是怎么说的？按照余先生的引述，王力曾在写于1987年9月25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1967年1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征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90页）王力“先后不一”的说法显然并不能证明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我认为，它倒证明了关锋当总政副主任有“正式任命”，但实际并未到职。

作为“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我也提出两份资料：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载：（1967年）1月8日 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关于关锋的“注”：“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两个相当权威的文献这样说关锋的根据在哪里？他们大概不是也不会是凭空而说吧！再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出版在前（1991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出版在后（1998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前者说得不对，后者应该改正，为什么没改和不改呢？

如此等等，都需要做出合理说明。我认为，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件事恐怕还需要更权威的材料才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 原载《记忆》第三十五期 2009.10.30

~~~~~

## 【史实探索】

###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

• 余汝信 •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是笔者写于六年前的一篇短文。最近，阎长贵先生对该文的结论——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本人和王广宇先生的印象，是“有任命，但未到职”。

阎长贵先生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机会。惟笔者依然认为，关锋的回忆与事实真相是相吻合的，而阎、王两先生的回忆应有误差。

关锋回忆道：“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

对关锋的话，应回到1967年1月时的大环境去判读。此前，自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总政及其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对于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各地军队院校学员到京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愈演愈烈”（刘志坚语）。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多少也被牵连，总政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威信已荡然无存。如果此时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他一介书生，有能力、有威信去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吗？毛、林不是傻子，关锋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上任，能起什么作用？

由于总政武功已废，毛泽东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机构，以取代总政，统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由徐向前挂帅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决非是派关锋一人去改造总政就能达致目的的。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的消息见报。该消息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决定。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改组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前文已有，此处略。载《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第一版）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比起原总政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规格高得多。组长徐向前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只是副组长之一；副组长中，加入了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则属于“留任人员”。甚至林彪的夫人叶群、代表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代表空军的余立金（空军政委）也都才是组员。

自此，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取代了旃坛寺（总政机关办公所在地），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阎文引述了王广宇先生的回忆。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回忆多半是将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两个机构混淆了；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总政副主任两个职务混淆了；将军委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误记为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误记为“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王的模糊记忆中唯一没有错的是，关锋确实排在名单的“中间位置”，但这决不会是总政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如果退一万步说真的只是任命关锋一人，按发文惯例不可能将全体总政副主任名单再列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只能是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阎文关于关锋衣着的批评，其实到了1967年1月再议论是没有必要的。自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建国以来首次穿军装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公开场合已经大多以一身军装示人。即使关锋1967年1月有新的军内职务（笔者认为是全军文革副组长，阎、王认为是

总政副主任)，他也不是第一天才穿军装。

至于关锋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应理解他的意思是没有到报社去上班、没有管报社的运动就是了，不必拘泥于他是否一次都没有去解决过上头交下的任务。关锋的意思是说一天也没有去上班，这大致是没有什么错的，李讷（肖力）正在那里造反造得欢得很，关锋要是不笨，还不躲着她！

关锋说：“7月份（笔者注：准确地说应是7月份之后）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其实不光是萧华、关锋倒了，连总政也瘫痪了，全军文革小组也不起作用了。8月份，他们全都被军委看守小组（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阎先生谓对笔者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笔者倒认为，在引用文献资料对史实进行判断分析过程中，官方的组织史资料往往比其他文献资料来得准确。

笔者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中引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证明关锋的名字没有列在文革初期的总政副主任名单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军队部分，资料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的、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笔者引述部分，还可见于该套资料（共六卷）的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版）49页和第五卷38—39页。总政组织部编的资料，总不至于将总政自己领导人的任职情况都弄错。还应说明的是，该套资料对于有任命而未到职者都列得很清楚，换言之，如关锋是有任命而未到职，也应列上，而资料中没有他的名字。

阎先生文中提及的两本“相当权威的文献”中有关关锋的信息，笔者认为均有误。试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提及（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根据惯例，当时的军委常委会议是须按开会日期顺序编号的。据有关资料，1966年11月30日召开第59次军委常委会议，1967年3月6日召开第60次军委常委会议，中间并无所谓1967年1月8日军委常委会议的记录。

2、根据当时的干部任免程序，总政副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任免，应由军委常委审核、请示林彪和军委各位副主席、常委批准后再报中央（笔者注：即指毛泽东）批准，并不是林彪一个人宣布即可任命的。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关于关锋的一个注释。该书的注释，部分颇为粗疏，尤其是有关军队干部的注释，错处甚多，不足为据。除关锋的这条注释外，第十三册注释错的还有：

1、53页，“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肖力造反后所任职务不是总编辑，而是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五卷47页）。

2、116—117页，“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军委只设主席、委员，没有设副主席，彭

仅是军委委员（《资料》第四卷6页）。

3、290页，“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仅为军委委员，不是常委（《资料》第五卷3页）。

4、302页，“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政委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一职早已免去（《资料》第五卷151页）。

5、355页，“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叶飞仅任政委（《资料》第五卷273—274页）。

6、360页，“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是指1973年8月，然而军委秘书长一职自1969年4月“九大”后早已取消，叶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资料》第五卷5、8页）。

2009年9月

□ 原载《记忆》第三十五期 2009.10.30

## 【文革探索】

### 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下）

• 卜伟华 •

#### 三、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

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基本上都是这样描述的：党的外交路线，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极左路线干扰、破坏，后又为毛泽东、周恩来所纠正。这种观点流行很广，但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早在文革之前，党内就开展了对王稼祥的批判，将他提出的在外交问题上比较正确的意见批为“三和一少”。从此，我国在对外关系上即逐渐朝着更“左”的方向滑去。长期以来，党在外交方面的方针、路线及重大决策即由毛泽东亲自把握。到“文革”发动之际，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所代替。党中央集体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的重要决策，可以被毛泽东的一句话所轻易否决。1966年上半年，在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和与日共联合公报问题上的结果即为两个很典型的例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左”倾思潮空前泛滥，中国对外关系全面紧张。到1967年夏，中国除与美国、苏联继续保持相互敌视的态度外，与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尼泊尔、蒙古、英国、捷克、肯尼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外交纠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还盲目乐观，认为“形势很好”（1）。这和他对对待国内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国内大动乱，到处都在打内战，毛泽东还要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有人说，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在对外宣传上“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这不是说明他在外交上还是有些正确的东西吗？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并不反对说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他只是说“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2），他并不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应该由外国人来说这句话。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等报刊确实也大量登载过外国朋友称颂中国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报道。

不仅如此，毛泽东本人在内部谈话中也明确地讲过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话。

1967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会议的全体人员并讲了话。这篇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他的对外关系主张。毛泽东说：“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是我们孤立，实际上他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区）也可以。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3）

毛泽东同意批判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他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了达到支持世界革命的目的，哪怕毁坏与邻国之间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在所不惜。

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就中国共产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组成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提出了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江青。5月26日，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4）由此可知，在1967年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缅甸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会谈，中共中央确定了要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搞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7月7日的讲话中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们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5）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他的对外关系主张都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关于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公开支持外国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输出革命等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盛极一时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现对毛泽东的错误的纠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文革全局性的错误之下，还存在一条正确的外交路线的说法，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集中反映在所谓“三砸一烧”（6）上，即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烧英国代办处。以上四次严重的涉外事件，在表现形式上非常相似，都是在与某一国发生纠纷时，不尊重国际惯例，不讲政策，以群众游行示威或召开大会的形式，对该国的驻华机构采取暴力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和新闻媒体对群众的盲目行动不仅不加制止和引导，反而推波助澜，使事件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事件都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我驻外机构都遭到严厉的报复，都使我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

据后来北京一些造反派头头揭发的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戚本禹策划的。戚本禹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根据这些材料和王力的“八七讲话”，很多人便将1967年在外交上的极左行动归罪于所谓“王、关、戚”。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

“王、关、戚”不过是替罪羊而已。至于是谁的替罪羊，却不是很清楚。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林彪、江青、康生在搞极左路线，“王、关、戚”应该是他们的替罪羊。

实际上，林彪是紧跟毛泽东的，但他在外交问题上并没有讲多少他自己的话。江青、康生确实在外交问题上发表了不少言词激烈、信口开河的话，但若将主要责任归于江、康二人，可能也还是不够的。

据王力回忆：“7月1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戚本禹等人的谈话中说：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毛泽东说：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今天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举例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7〕

这是一则非常重要的史料，对于我们解开1967年外交上的极左之谜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王力的这个回忆是可信的，有三条有关材料可以与之相互印证。

材料之一，即王力的“八七讲话”。8月7日晚，在王力与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谈话时，“联络站”的代表就提出：“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7月1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8〕这份记录中提到的“主席7月1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应当就是王力所回忆的毛泽东与张春桥、戚本禹等人的谈话。

材料之二，即毛泽东1967年7月7日的讲话。毛泽东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已起来。缅甸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有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60%，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9〕这篇讲话距毛泽东7月1日的谈话相隔不到一周，所讲关于缅甸的内容一脉相承，应当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材料之三，大约在8月10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王、关在讲话中对外交部多方指责。关锋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关于缅甸问题，如果是在7月1日以前，那没有什么话可说，7月1日后，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的，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10〕在姚登山传达的关锋讲话中，明确地披露了毛泽东7月1日谈话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间接的材料。1967年7月初，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少数人不满中国的革命宣传，到中国图片展览馆捣乱，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向尼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后，尼方申明它珍视两国友谊，不允许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在尼土地上发生，为图片展览馆事件向中国表示道歉。中国大使馆认为可不再提书面抗议了，但康生却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于7月21日就“尼泊尔国内的反动势力侮辱中国人民和蓄意破坏中尼友好的严重反华行为”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最强烈抗议。〔11〕不难看出，康生是在现买现卖，他的主张不过是毛泽东在缅甸问题上主张的翻版而已。

#### 四、关于文革回忆录



回忆录是文革研究的重要资源，而且因为文革档案的缺乏和不开放，更显出其重要性。文革史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就是由回忆录为我们提供的。上述王力回忆录中关于毛泽东1967年7月1日的讲话，为我们解开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根源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还有如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过去他的一些供词曾被作为给林彪事件定性的重要依据。九一三后，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吴法宪写了大量的材料，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他写的材料过去就曾被一些细心的人们所质疑，现在吴法宪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必然会对过去以他所写材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

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了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毛泽东要整林彪，说 he 有两个纲领，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天才论，如果林彪根本就没有想当国家主席，那么所谓的政治纲领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看了吴法宪回忆录以后，就预言它将会对文革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1967年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在天桥剧场辩论会上散发了一份《紧急呼吁书》，对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违反政策，随便打人的现象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当场表示支持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份《呼吁书》还被印发给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时隔不久，中央又正式通知收回了这个《呼吁书》。这是怎么回事呢？二十多年以后，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的回忆录《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穆欣说，这个《呼吁书》是王任重送给周恩来，并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的。周恩来同意王任重的意见，将此件送给毛泽东和江青。毛泽东、江青都圈阅同意后，陈伯达批交办公室办理。当时穆欣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主任，他认为已经决定要“公开印刷，广泛张贴”了，当然可以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员看看，于是就印发到了会上。穆欣披露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即毛泽东原来是肯定这个《呼吁书》的，后来改变了态度，变成否定这个《呼吁书》的了。所以才有了先印发后又收回的情况。而且，穆欣的回忆录还为我们了解陶铸、王任重这两

个重要人物在文革中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提供了线索。

无庸讳言，回忆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史实不准确、美化拔高自己、文过饰非、选择性记忆等等都是回忆录的通病，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免俗。有些回忆录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问题更为突出。

汪东兴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问题很多。在这本书里，看不到毛泽东对文革这场大灾难应负的主要责任，读者看到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只有伟大、英明、正确的一面，只有毛泽东的“非凡的胆略和气概”、“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等等；在这本书里，看不到文革中几亿人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严重教训，读者看到的只有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本书里，对毛泽东的错误避而不谈，大谈所谓毛泽东精通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汪东兴在这本书里将毛泽东在当时所作的、包含不少错误内容的讲话，不加分析、不加说明地大量引用，奉作经典。反复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谈话，而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早已被人们所抛弃了。汪东兴的回忆录出来以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

还有一个张耀祠的回忆录，也存在许多类似的问题。张耀祠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中说：“在主席南巡时，叶群已向黄永胜送去了秘密亲启件：现在情况很紧，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来到林彪的房里，叫喊起来：‘一〇一，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林彪说：‘慌什么，快，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政变不成逃往广州。”“9月12日晚，林立果按照林彪的决定，给北京周宇驰打电话，命令他说：‘南去不成，速向北逃。’”看他张耀祠说的那么热闹，其实都是虚的。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林彪、叶群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没有任何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所谓大、小舰队有多少人参与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耀祠是在信口开河。另外，这本书里还说：“打倒那么多老干部，都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干的，凭心而论，主席是不知道的，他们瞒着主席四处整人。”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陈丕显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被称为“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所谓“官式文革史观”，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种说法是一种为尊者讳的说法，余汝信批评说：“主次关系、主配角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实际上，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我认为他说的不错。

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对柯庆施1963年12月25日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了指责，称“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就在柯庆施这次讲话前的十几天，毛泽东发出了一则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

咄怪事”。是有毛泽东的批语在前，柯庆施的讲话在后。主次关系如此清晰明了，那么，“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的，为什么不是毛泽东的批语反倒是柯庆施的讲话呢？陈丕显确实是颠倒了主次。

文革中有一张著名的漫画《群丑图》，刊登在1967年2月21日出版的由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北京“二司”）办的《东方红》报上。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翁如兰（12）。《群丑图》中有刘、邓、陶、彭、罗、陆、杨等有名有姓的人物39个（13），用古代官员出巡招式，排列成S形队伍，向着“资本主义”悬崖走去。这张漫画的内容十分丰富，文革发动时期的各种批判大都有所表现，可以称为文革发动史的缩写。画中人物，运用漫画最基本的技法：大头小身体。尽管体态动作夸张，头部描绘却十分形似，显示了作者的专业水平。《群丑图》的出现应该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此画一出，反响巨大，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都对这张漫画提出过批评认为是丑化党的形象，但这张画的出现符合当时运动的“大方向”，被各地竞相翻印、复制。随着运动的进展，被点名、批判、揪出的当权派人物越来越多，又出现了几种版本的《百丑图》。《百丑图》中人物硬凑成百人，都是头像，是群众大批判漫画头像的摹本。《百丑图》名声也很大，但从历史、艺术、技法而言，同《群丑图》不在同一档次。

傅崇碧在《“文革”中的卫戍区》一文中回忆：

1967年武汉事件后毛泽东接见他，见到他“放在面前一大卷纸，主席问：‘那是什么？’我说从钓鱼台出来时，有人拦住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我还没看。主席说：‘打开我们看看。’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主席看到上面画的是贺龙等领导抬着刘少奇，罗瑞卿口内含着刀，许多被丑化了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跟随在后。主席生气地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主席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在《机要秘书的回忆》一文中回忆道：

有一天，我收到一卷小报，外面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就是把一大批老干部描绘成为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骂林彪、江青之流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我们将收到的信件都及时送给了光美同志，她从中选择地给少奇同志看。如那张“百丑图”，就在少奇同志的茶几上放了好长时间。

这两个回忆都提到了《百丑图》，但从其中有关于“抬轿子”的描述看，显然他们都搞错了，错把《群丑图》当成了《百丑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记忆差错在回忆录中是多么普遍。

另外我再谈谈关于文革文物的问题。我最近看到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证照中国：1966—1976》，其中收录了文革时期大量的文物，包括：大字报、传单、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学生证、大会入场券、入伍通知书、毕业证书、粮油供应证、选票、平反证明书、工作证、红卫兵证、乘车证、代表证、奖状、海报、请柬、节目单、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文革文物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对我们了解、研究那一段历史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任用，但我在其中也发现了一些有疑问的藏品。

报告会入场券

（一）向知识青年金训华学习

(二) 于会游同志主持

中共中央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晚七时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内

(第 3 4 页)

点评：这张入场券的格式、时间、主办单位都有问题。把大会的主持人名字写在入场券上很少见。于会游这个名字未曾听说过。中共中央文化部的名称不伦不类。

金训华是上海知识青年，他 1 9 6 9 年 5 月到黑龙江省逊光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到农村刚刚 7 7 天，在 8 月 1 5 日，金训华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子而牺牲，时年 2 1 岁。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金训华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省知识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和全省人民向金训华学习。1 9 6 6 年绝不可能有关于向金训华学习的口号，这张大会入场券比较容易鉴别，可以判定这是一个低劣的赝品。

革命批判大会  
入场券

一、批判劳动惩罚读书做官论  
二、江青同志讲话

一九七 0 年九月十日上午八时  
中共中央革委会  
地址：北京工人体育馆

(第 7 4 页)

点评：只要看一下主办单位：中共中央革委会，就可以断定这张入场券是伪造的。1 9 7 0 年 9 月 1 0 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日子。当天不可能在北京开那样一个所谓“批判劳动惩罚读书做官论”的大会，而且由江青去讲话。中共中央革委会只是拟议中的一个名称，实际并未存在一天。

1 9 6 8 年 9 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委会后，中共中央原打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革委会事宜。9 月 1 5 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9 月 1 9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等人正式开会讨论并提出“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1 4）这样关系国家体制的重大问题，相信应是毛泽东考虑过并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打过招呼的。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拿不定主意，他说“暂时不宜成立”，那最后是不是还要成立呢？从将“全面夺权”进行到底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委会后，成立中央的革委会。但成立中央革委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谁来当中央革委会的主任？如果成立了中央革委会，它就成为体现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象征，就不可能是短期的，可能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会带来修改宪法的问题。还有，中央革委会成立后，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这些机构还要不要，如果要，中央革委会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不要，其职能都由中央革委会来行使，那么中央革委会这个机构就可能会变得非常庞大。就是成立了中央革委会，7 5 岁高龄，身体和精力远不如前的毛泽东也不会当这个革委会的主任。毛如不当，理所当然就应该由

林彪来当中央革委会的主任，但这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再也没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各大院校革命师生  
第二次联合揪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万人大会

入场券（专场）

时间：1967年4月19日上午八时整

地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院东大厅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第26页）

点评：这张入场券书也可以判定是伪造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于1967年4月20日，怎么可能在它成立的前一天就以它的名义组织万人大会？另外，在主办单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前面，加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更加证明其伪造无疑。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是内部办公机构，从不对外公开活动。地点也是问题，既为“东大厅”，又怎能开“万人大会”？

据我看，《中国证照》这本书里的大多数文革文物还是真的，对于文革研究有参考价值。但确实有些假的东西混杂其间。对待文革文物和对待文革回忆录一样，应该认真解读，进行分析，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释：

〔1〕 毛泽东：《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1967年7月7日），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学习资料》。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也见诸其它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材料中。

〔2〕 1968年5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重要通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126页。

〔3〕 毛泽东：《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1967年7月7日）。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5页。

〔5〕 毛泽东：《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1967年7月7日）。

〔6〕 指北京的造反派于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7〕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页。

〔8〕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动态组根据记录整理的《王力同志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的重要讲话》。

〔9〕 毛泽东：《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1967年7月7日）。

〔10〕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所编的《动态》第120期上（1967年8月12日）刊登了姚登山的传达讲话。

〔11〕 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12〕 翁如兰，1944年生于北京，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师于叶浅予先生，主攻人物画。文革中因作《群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后被“下放部队农场改造三年”。后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任教，后侨居国外，

从事绘画创作活动。

（13）《群丑图》中的39人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李井泉、李维汉、刘澜涛、王任重、林枫、安子文、刘仁、万里、钱信忠、吕正操、刘志坚、梁必业、肖望东、何长工、肖向荣、蒋南翔、周扬、夏衍、田汉、林默涵、齐燕铭、阳翰笙、邓拓、吴晗、廖沫沙、陆平、陈鹤桥、王光美、严慰冰。

（14）毛泽东：《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毛泽东传》（下），第1528页。

□ 选自“卜伟华博客”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一）

• 舒 云 •

1、为什么要把“两案”绑在一起？

审理“两案”时，广州是最大的疑点。广州谁接飞机？就是没人承认。顾同舟不可能，丁盛不承认。九一三事件后，白云山有个林立果的“据点”，广州军区查了半个月，弄不清，没发现证据，就没管。接华国锋班的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卜占亚说，湖南组织了几十列车厢和一批干部，到广州迎接林彪。这事株连了多少干部，后来卜占亚说，他的这个交代全是假的，是被逼的，当时的交换条件是还当他的副政委。总政取证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所以凡是没证据或证据不确实，只有一人口供作证，或证据有矛盾，一律不定罪。黄吴李邱是否参与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李伟信说，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走。证据不足，拿掉。起诉的罪行减成55条，后来又减成48条。中央的政策是打击主要的，不要打击面过大，宁愿不定，作为悬案，不要让更多的干部受牵连。15个罪行去掉了，一月风暴、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抓五一六，冲北展的武斗，七二〇事件，北兵南调，第一号令……这样去呀去呀，去了半天，这些都没有了。最后一稿，发现“大舰队”没证据了，四大将与政变是什么关系？南逃计划他们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知不知道？都是疑点，查的结果证明他们不知道，“两谋”没牵扯他们。

这一来，说不清了，拿不出具体数字和事例，让人信服、有血有肉的东西拿不出来。又不是政治宣言，必须实打实，轰动全军的事都拿不到起诉书上去。但是缺乏证据，又必须审判，怎么办？邓小平拍板，一案起诉，分开审判，成立“两案”领导小组，下决心把“两案”合到一块。1979年底到1980年初，军队还搞军队的，后来两个起诉书合在一起写，有的单独列，有的联合在一起。以公安部为主，军队提供情况，从全军抽人，保检法三家，组成“两案”办。审完后，还有十几个军以上干部，有8个起诉，13个免于起诉，免于起诉的一律师级待遇。

现在看，九一三事件是人造出来的，整个政治需要这个事件，才造出来的。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毛泽东能和江青分开，林彪为什么不能和叶群、林立果分开？

王年一说，九一三事件是党内最大的谜。虽然材料很多，但关键性的材料甚缺。对林彪事件的研究很不充分，总的说还处于较低的层次。由于官方的限制，好多问题说不清楚，要达到一定深度很难。

我们坚信，再大的谜也会有谜底，九一三事件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2、林豆豆为什么坚持“绑架说”？

张清霖回忆：我们在下边看，闪着灯的三叉戟就在头顶，向南飞，往西，又往北，飞得很慢，响声消失了。林豆豆特别镇静，问我，你好多事猜得很准，飞机会怎么样？我说，飞机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出了国境就会掉下来，我分不清往南往北，全凭预感。林豆豆说怎么会掉下来？我说首长不知道，到一定时候不能不告诉首长。首长知道后，不让去苏联，空中搏斗，飞机会掉下来。林豆豆说，真要掉下来就好了，首长就超脱了，再也不会痛苦了。如果没掉下来，真飞到莫斯科，还没等首长下飞机，就会被活活气死。我说，不管是死是活，只要到苏联，就可以利用。林豆豆一直看着飞机消失的方向，没掉一滴眼泪。非常奇怪，我认识林豆豆后，她每天要测体温，每天都神经性低烧。就在那天晚上，再也不烧了，一直到现在，再没低烧。

1980年审理“两案”前，成立了总政取证组。批林七八年了，林豆豆是重要证人，取证组到河南找林豆豆取证。听她一谈，大惊，她的材料有变化，说法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原来并没有说“劫持”。林豆豆解释说，当时说他们走了，没说这么细。张清霖说，林豆豆印证。取证组的工作人员回忆：河南省委搞的录音，录了70多个小时，整理出6小时。

林豆豆说：林彪是好人。林立果、叶群是坏人，还整了她。看林立果和叶群行动反常，绑架是肯定的，报告过，并不知道叛国。取证组的工作人员说，那时没林彪是好人这个调。80年代初突然来这个调，根据这个行吗？我都不敢继续往下搞了，请示“两案”办，与原来说的不一样。“两案”办让记下来。光女儿的口气有变化，最后没采纳，如果第二个活人在，也行。没有，死无对证，历史不好写，就在这。“文革”不是一风吹掉，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背景。为什么林豆豆这么说？取证组分析，一开始那种情况，不敢说也可能。九一三事件突然出来，说真话会受限制。审了七八年，经过考虑有新的说法，也不奇怪。现在把林彪说的好点，对她有好处。没第二个人说绑架走的，我个人不敢下这个结论。林豆豆的证取了，没用，只她一个，只能是看法。林彪内勤小陈、小张也不敢变。中央不采纳是对的，没新的证明，等着后人把所有的材料翻出来。

于是“两案”还是用以前的结论。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林豆豆始终坚持“绑架说”，从未改过口。

9月13日早9时，林豆豆给周恩来打电话，张清霖和空军保卫处长杨森在旁边。这时周恩来已经知道飞机坠毁，他没说话，只问你是林豆豆，怎么样？

我现在还好。

你爸爸（林彪）知不知道这事。

他不知道，是林立果绑架的。

要跑，为什么要跑？

毛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整黄吴李邱，要搞掉首长。

周恩来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周恩来装着对毛泽东南巡也不知道）。张清霖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就没有进住的房子，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拿。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问洗漱用具要不要拿，我们说一样东西也不要，原封不动。给我们捎来的皮鞋还放在那里，没动。我们请求中央保护现场，把叶群的一箱东西保留住。后来叶群的那个箱子，被汪东兴处理过。

过一两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与我们在56楼谈了半小时，问有哪些事。林豆豆对他说，首长是被绑架的。林立果要跑，9月8日说不行动，一切过了国庆节。王良恩问，你爸爸知不知道。林豆豆说，不知道，他是被骗推上车的。

张清霖回忆：我们不相信张宏，信任姜作寿。中队长萧奇明“陪”我们散步，过一段，不说林副主席了，改口林彪。我对林豆豆说了这个变化，她没吭声。10月3日晚，姜作寿单独找我们谈话。林豆豆的意见叫杨森一块走，姜作寿说杨森与你们不一样，他单独走。姜作寿一直在专列上“陪”着我们，在北京哪个车站，30多岁的谢静宜带着黑颜色车接我们，送到玉泉山，车窗户用布挡着，从此被软禁。这以后，本来是“功臣”的林豆豆由被江青、康生定为林彪留下的“钉子”，设立了专案组，林豆豆被逼得死去活来，但是并未改口。至于她写的“绑架说”的材料怎么无影无踪了，怎么变了调子？那只能问往上送材料的专案组了。

林豆豆和张清霖被关到玉泉山，一直提要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1972年初毛泽东让周恩来见。周恩来拖了8个月，才接见林豆豆，他说晚一点也好。但并不是林豆豆要求的个别接见，在座的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等，成了一场集体谈话。周恩来问九一三事件的情况，严厉批评林豆豆：“你还认为林彪是让林立果绑架走的吗？他是副统帅，别人怎么命令他？”

由此可见，林豆豆一直坚持“绑架说”。

“两案”总取证组的工作人员说：家庭矛盾和政治搅到一起，林豆豆没证据推翻，被坏人劫持，敢信吗？可是谁又能反驳呢？审判九一三事件，死者不在审理范围，取证组转向几个大将。当年批林批孔的材料，大部分被推翻。集团就不是，剩下大将有啥罪定啥罪。错的也没纠正，过去就过去了。当然，现在这个调子并不一定永远站得住脚。

3、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什么大病一场？

其实，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身体就夕阳西下了。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到北戴河去，走前他在候机室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最近中央内部路线斗争很激烈。胡萍对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并不是很清楚，他想，庐山会议后中央有谁？陈伯达、周总理、康生三个常委在北京，那是谁？陈伯达在庐山被打倒，就剩康生和周总理，是周总理？搞不清，也不好问。林立果说，毛泽东南巡，病得很重，说话很困难，咳嗽厉害，有时喘不过气来，很危险的状态。事后胡萍说，他当时相信毛主席病得很厉害。因为前两个星期，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来，叫准备个飞机到海南岛。说主席一到冬天，气管炎就犯了，那里气候好，他去看看。

据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1971年毛主席就身患重病。保健医生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从入冬以来就不好，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每日阵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

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陈毅追悼会，考虑到79岁的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出席。但毛泽东1月10日中午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他别的衣服不愿穿，执意穿睡袍，回来后毛泽东病情加重。

1972年1月28日零时，医生摸不到毛泽东的脉了，好在虚惊一场。2月上旬，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导致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张耀祠说，主席休克那天，我没记住，不是9日就是10日，不敢记，制度规定不许记。时间长就忘了。

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毛泽东休克，医生随即赶来。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把手贴近毛泽东鼻孔，发现呼吸停止。他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几分钟后，毛泽东恢复心跳，慢慢睁开眼睛。张耀祠说：李志绥（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知识分子，就这点不好，自高自大，病情知道了，不敢下决心。我批评他，你是医生，病情你知道，还不下决心。李志绥怕。主席不愿意吃药打针，受罪的是主席。主席不同意是主席的事，提建议嘛，病一拖，老人经不起。杭州主席病重，与抽烟有关系，南巡身体就不大好。他死大概也死在肺上，解剖时发现肺部有两个泡。如果不那么累，不抽那么多的烟，按医嘱吃药，主席还会活下去。

那么，毛泽东这场大病和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很大的刺激。

对毛泽东来说，抽烟、讳疾忌医和九一三事件比起来，是九牛一毛。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再重的病，也会慢慢康复。只有九一三事件，将毛泽东打倒在地。毛泽东心里清楚，看透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林彪，一个周恩来。周恩来是决不能当接班人的，选林彪接班，也只是个幌子。毛泽东并不真心想让林彪接班，他也知道林彪接不了班。林彪虽然比毛泽东年轻，但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得远，绝对活不到毛泽东之后。给林彪看过病的解放军总医院专家非常奇怪，为什么毛泽东选病魔缠身的林彪当接班人，他接得了班吗？而现在，刚树起的接班人突然逃往国外。如何圆场？也许毛泽东并不担心如何向世人交代，而是如何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

这是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啊！

无疑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病情更加雪上加霜。

毛泽东越来越明白，林彪自我爆炸，也炸碎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也死了。

如此，毛泽东再无回天之力。

沉痛悼念九一三事件的牺牲者！为他们默哀，愿他们早日回家！

4、256三叉戟的黑匣子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

256三叉戟半夜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机上的九人全部遇难。最先赶到现场的是蒙古人，接着是苏联人，他们到底是如何勘测事故现场的，没有见到正式文本。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几十个小时后才到，不要说现场已经被救火者和蒙古人、苏联人破坏，就是原始现场，没有内行，也只能看个大概。而中国关于256三叉戟失事原因，是1972年以王海为首的五人专家组关在屋子里研究外行的现场照片确定的。

结论是256三叉戟因为油不够了，迫降野外没有成功。

但是，事实确是如此吗？

目前惟一的知情者就是 2 5 6 三叉戟上的两个黑匣子。

而去现场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根本不知道飞机上还有黑匣子。不过就是他们提出，蒙古人给不给还是另一回事。也有人说，黑匣子找到也没用，不能说明动机，为什么迫降？另外一个东西，话音录音器是不是好，也不敢保证。

西方国家 6 0 年代以后开始陆续装黑匣子。过去老式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出事很难查，由于电脑发展，飞机的技术信息编成密码，飞机的一切动作全部被记录下来。黑匣子有个好处，能抗高温和强烈振动，保证信息能拿出来。特别是英美等国，专门有一套机构研究。黑匣子很复杂，你用它的飞机，出事要找它翻译，要花很多钱。后来中国飞机出事，还是送英美破译，苏联搞黑匣子很晚，是另一套。

不知道为什么苏联人至今仍对 2 5 6 三叉戟保持沉默，3 8 年了，真沉得住气！蒙古人或多或少说了一些，中国的知情者也在说，而苏联，只有个别退休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凤凰卫视胡说，说听当地老百姓说，2 5 6 三叉戟飞到了苏蒙边境。这明显是个谎言！听当地老百姓说，强大的苏联雷达干什么吃的？2 5 6 三叉戟飞进蒙古，虽然中国的雷达够不到了，但还是知道 2 5 6 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从地图上看，赤塔距离中蒙边境 4 1 4 号界桩 8 0 0 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 6 0 0 公里。而 2 5 6 三叉戟 1 点 5 5 分飞进蒙古境内，2 点 3 0 分坠毁，3 5 分钟 2 5 6 三叉戟飞了 1 3 0 0 多公里，这怎么可能？2 5 6 三叉戟在国内飞行距离是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二，时间也是三分之二，而在蒙古境内飞行三分之一的时间，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正是三分之一的距离。所以 2 5 6 三叉戟不可能飞到苏蒙边境，再返回温都尔汗。这么长的距离，2 5 6 三叉戟的油量和时间都是不可能够的。

现在看，2 5 6 三叉戟的黑匣子被苏联人拿走了，而且已经破译，透露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内容。但是，有没有机内说话的内容呢？应该是有的。

如此说来，2 5 6 三叉戟的失事原因，只有苏联人心知肚明，但为什么苏联人对 2 5 6 三叉戟的黑匣子一直秘而不宣呢？极有可能黑匣子披露的机内说话内容与中国官方的说法不同，否则没有必要沉默。

1 9 9 2 年 1 1 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为顺利签署俄韩基本条约，亲手将 1 9 8 3 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 0 0 7 客机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韩国人发现“黑匣子”是假货，但最终找到原件，并移交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

为什么 2 5 6 三叉戟的黑匣子不能归还？

更何况苏联已经解体，克格勃已经不存在，有什么必要还保留近 4 0 年前的 2 5 6 三叉戟的遗物呢？

2 5 6 三叉戟黑匣子浮出“水面”，或许会震惊世界。

5、为什么中国没有提出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1 9 7 1 年 9 月 2 9 日，蒙古广播电台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于 9 月 1 3 日凌晨 1 时 5 5 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2 时 2 5 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 1 1

1度15分，北纬47度42分，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的下午，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达勒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强调这并不是政府声明，而只是一般消息。并表示：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我们感到很遗憾。蒙古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也在参加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主动向许文益大使通告。

看来蒙古方面并没有什么恶意。中国方面如果提出到现场勘测，并提出要回256飞机的遗体遗物，蒙方也不会阻拦。要是按现在的观念，飞机是英国的飞机，如果是机械问题，还应该向英国要求赔偿。

但中国方面一开始就没有到现场的意思。至于向英国索赔，更是连想也没有想。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二手货，巴基斯坦有了更先进的波音飞机，对三叉戟不再感兴趣。而西方封锁中国，中国能得到三叉戟，也很了不起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如此一波三折，中国根本没想到找英国赔偿，更何况中国那时认为钱是资本主义，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还拒绝国际援助。那时只想息事宁人，决不可能把事情搞大。

1971年9月22日凌晨，周恩来听完坠机现场赶回国内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一秘孙一先的汇报，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根据现场照片和示意图，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几个人中，只有李际泰是飞行员，但他没有飞过三叉戟。李际泰认为“三叉戟是因为油不够，迫降没有成功。在场的人认为有道理，周恩来就此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1971年9月23日，中国驻蒙古大使向蒙方说明：我们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看来，中国政府只要“机毁人亡”就足够了。至于为什么“机毁人亡”，完全没有必要知道，根本谈不上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取证。

周恩来到西郊机场看与256三叉戟一个型号的252三叉戟，并让专家确认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确是中国的256三叉戟。

1971年国庆节凌晨2时，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空军参谋长梁璞、孙一先等也到西郊机场看飞机，分析迫降的可能，自圆其“说”。

飞机失事的原因可以放在一边，机上的九具遗体也不管吗？

蒙古9月的白天还比较热，遗体需要尽快处理，蒙古提议就地安葬。

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蒙古方面要求把遗体运回来。

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的人员身份，他们只是强调是军用飞机。由于中方道歉，也没再多发难。但蒙古人很“狡猾”，要求中方提供机上的死者名单和身份。周恩来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争执，可能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建议，

要求就地火化。但因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于是就地安葬。

2 5 6 三叉戟的遗物也要了，但中国坚持飞机是“民”，而蒙方坚持飞机是“军”，是“军”是“民”，中蒙两方没有达成协议，要遗物也就不了了之。

3 8 年了，温都尔汗的坟堆早就被风吹平了。三叉戟上九个人涉及七个家庭，七个家庭的家属如果提出要求，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会考虑的。因为中国政府曾经索要过遗体。而现在再提出来，蒙古政府不会再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了。

至于前苏联方面拿走的林彪和叶群头骨，相信只要中国政府出面索要，俄国政府也没有理由拒绝。

6、2 5 6 三叉戟到底是“军”还是“民”？

1 9 7 1 年 9 月 1 6 日，中蒙双方关于 2 5 6 三叉戟的第一轮会谈开始，蒙方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9 月 1 3 日 2 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气象情况。飞机失事原因，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上午 1 1 时，第二轮会谈开始，蒙方强调 2 5 6 三叉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孙一先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认为蒙方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到现场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却坚持在纪要写明是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以及没有外来影响坠毁，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是被苏、蒙军队击落，则可以推卸责任。

中国方面则坚持认为是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

蒙古方面认为：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文益大使说：根据我的理解，蒙方不认为这架飞机对蒙古有什么不好的行动，因此，这架飞机乘什么人，做什么用，那是很次要的问题。你们方面提到这架飞机上有军事人员，一般说我也不反对，但另一方面，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我认为这是很细小的问题，我曾跟司长讲过，我们的民航有的是军人驾驶的，我不知道蒙古民航是否也是军事人员管理和驾驶的，但我知道有些国家是这样的。蒙方坚持认为：我们的材料证明他们都是军人，我们从里面找到的东西，没有能证明是民航飞机。

许文益大使说：我不反对说里有军人。孙一先补充说：但第一，这里面有非军人，第二不能说军人驾驶的飞机不是民航飞机。许多国家的民航是由军队管理和领导的，我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的，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

蒙方还是认为飞机没有证明是中国民航。

孙一先说：飞机上写着很大的“民航”字样。

所以，中方不同意写上全部是“军人”。

而蒙方坚持要写上全部是“军人”，最后没有达成协议。

256 三叉戟为什么要刷上“中国民航”的字样？这说明，它就是作为民航飞机而用的，虽然是专机。

7、为什么中国强调迷航，误入蒙古境内？

256 三叉戟是专机，专机没有固定航线和固定时间。

九一三事件突然发生，中国高层首先要保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让林彪在飞机上的事实扩散。不要说外国，就是当时处于核心指挥位置的空军指挥所里，除了李德生外，所有在场者都不知道外逃的大飞机上有林彪。不要说当时在指挥所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参谋长梁璞等，就是多少了解一些内情的空军副参谋长王飞也不知道飞机上有林彪。

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与没来得及上三叉戟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过电话，陈联柄和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只知道他们没上飞机，但飞机上有谁不知道。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在三叉戟起飞后，在山海关调度室反复问八三四一部队的大队长姜作寿，飞机上都有谁？姜作寿没说。

现在看，只有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张宏和姜作寿以及林豆豆、张清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耀祠、汪东兴等极少数人外，许多当事人都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

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认为，只有保住密，才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这种情况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按蒙古说的是中国军用飞机，那事情就大了！

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空中立法的多边公约——1919年《巴黎航空管理公约》正式确立了领空主权原则。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的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基于这一原则，公约规定：一缔约国的军用航空器未经特许不得飞越或降落于另一缔约国的领土。1944年《芝加哥民用航空公约》第三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用于军事、海关和警察部门的航空器，应认为国家航空器；一缔约国的国家航空器未经特别协定或其他方式的许可并遵照其规定，不得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空飞行或在此领土上降落。”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近海海域上空侦察。它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与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国飞机相撞，致使一架中方飞机坠毁。事发后，受伤的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严重侵犯了中国领空及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此举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给中国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国际法上的全部责任。

2001年4月6日，《联合早报》特约发表阮次山先生的文章：《从国际法观点分析中美撞机事件》。阮次山认为：4月1日发生的中国战斗机和美国EP-3E型侦察机在海南省附近撞机事件，从美国政府，布什总统到国务卿鲍威尔，从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到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布莱尔，都试图从国际法角度，“框”住此事件，一再重申，这次撞机事件纯属意外。因为如果不“咬死”此事件属于意外，美国就必须负起此事件的责任，也就承认中国对意外事件有司法管辖权。这架美国军机受损过重，必须紧急降落海南岛的陵水机场，这种行为符合1944年的芝加哥国际民航公约规定，不属于侵入中国领空的行为。美国政府用此基本底线划出其对此意外事件的“国际法轮廓”，主要策略是：避免中国当局运用国际法的“管辖权”原则去处理此事件，因为，如依据国际法“管辖权”裁定的三大原则：（一）国籍（即出事飞机的国籍归

属);(二)发生地;(三)意外事件受害者国籍。作为事件的受害国和肇事飞机的降落地国,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管辖权利,包括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的权利。

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一般说来,条约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而对非缔约国并无拘束力。中国是国际民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旧中国政府于1944年11月9日签署了《芝加哥公约》,并于1946年2月20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1950年5月,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要求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1年11月19日,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通知我国政府,国际民航组织第74届理事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2月15日,我国政府致函国际民航组织,承认《芝加哥公约》并从即日起恢复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

虽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中国还不算《芝加哥公约》成员国,但除了国际法,还有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出现在国际法之前,虽不成文,但经各国不断重复而具有法律拘束力。国家对领空具有完全的、绝对的、排他的主权。有权禁止外国航空器进入其领空,对擅自飞越的航行器,国家有权采取警告、驱逐、迫降、紧追等必要措施。对侵入的外国军用航空器,国家有权将其击落并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议,要求其承担责任。

如果按照国际法,256三叉戟作为军用飞机,坠毁在蒙古境内,蒙古有管辖包括调查权。如果是民航飞机误入他国,则是个一般事件,可以按照国际法处理。

军用飞机与民航飞机在国际法上是有明确区分的。

中国民航误入蒙古失事,中国有权提出派出专家调查飞机失事原因。

做出正确的事故结论必须由认可的专职机构承担物证分析工作,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

飞行事故原因调查是工程技术调查,由飞行事故调查机构的专家进行。飞行事故责任调查是行政、司法调查,由行政或司法部门进行。

国际民航组织颁发的《飞机事故调查手册》指出:“调查一起飞行事故的主要目的在于搞清楚与该次事故有关的事实及环境条件因素,以便确定其可能的原因,从而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类似事故及其导致因素的再次出现。”在每次事故调查中,只有科学地查找到导致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制订出有效的预防措施,达到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目的。

2002年4月1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从北京飞往韩国的CA129航班在韩国釜山坠毁。空难发生四个小时后,国航发表声明,全文如下:此次航班上载有旅客155人,机组11人。其中韩国旅客135人,中国旅客19人,乌兹别克旅客1人。据韩国方面消息,44名幸存游客和机组人员正在抢救中。事故目前处于调查分析和善后处理阶段。我公司对此次事故非常悲痛,并对所有遇难乘客的家属表示最深挚的哀悼。为做好此次事故善后工作,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理程序,成立了以公司最高层领导为首的应急处理小组,并派出工作组前往韩国处理空难事故。对于国内国外旅客的善后工作,公司也做出了安排。我们将按照国际通行的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程序,配合有关方面,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以及有关民用航空法规,进行善后工作的处理。

当然,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航空器包括军用航空器在飞越他国领空时,受领空地面国管

辖，应遵守该国法律和规章。飞机在国外失事，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由飞机所有国负责调查。可是，256三叉戟却没有派专家到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如果中国方面提出派专家调查事故原因，被蒙方拒绝，是另一回事。而中国政府连提也未提！

顺便再说一说关于赔偿的事情。

华沙公约是1929年由各国在波兰首都华沙所签定的公约，它是全球有关民航机空难与赔偿责任的始祖。以后又出现海牙条款、蒙特利尔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61）、瓜地马拉城条款（1971）、蒙特利尔补充条款（1975），等一连串或为修正条文，或与货物赔偿有关的规定。华沙公约第25条规定，若空难责任属航空公司、机场或飞机制造公司者，旅客可以提出赔偿诉求。200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发生误入跑道的空难事件后不到四天，即向死者家属主动提出每位42万5000美元的赔偿。

如果256三叉戟的调查结论是由于英国三叉戟的机械问题引起，死者家属当然有权向英国索赔。

8、毛泽东为什么问三叉戟上有没有活人？

1971年9月13日，天还没亮，中国情报部门就侦听到三叉戟坠毁。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以后，李德生在空军指挥所说：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拍着手，高兴地笑了。

林彪的大红旗离开北戴河别墅，疾驶过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部，大队长姜作寿到路中央拦车，差点儿被撞。中队长萧奇明愤怒极了，他飞快地追车，他忘了这是防弹大红旗，连开两枪。萧奇明是神枪手，他的两枪打在司机头部位置，但因为车向前移动，这两枪的弹着点正在林彪的位置上。如果不是防弹玻璃，林彪就被打死了。毛泽东得知非常生气，说打死了怎么办？到底是谁害谁？打死了林彪就说不清楚了。因为没有后果，汪东兴说算啦，萧奇明没有被处理。

9月13日白天，中国政府已经得知三叉戟坠毁，但是机上是否还有活着的人，不知道。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将机毁人亡的情况报告外交部。很快汪东兴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想了一下，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油了？还是把机场看错了？汪东兴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泽东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汪东兴无法回答。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到坠机现场，亲眼看到三叉戟上的人员全部死亡。消息传回国内，据说毛泽东破例喝了红葡萄酒，笑着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林彪没摔死就不是帮忙。

毛泽东为什么关心三叉戟上有没有活着的人？

1955年中国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参加万隆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机场加油时，被台湾特务往油箱里放了一颗小型的定时炸弹，使之坠毁于公海。机毁了，但人未全亡，机上乘员中有三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提供了飞机坠毁前的各种情况，对顺利破案提供了极重要的帮助。如果三叉戟上有活着的人，三叉戟坠毁的真相就会揭露无疑。

9、256三叉戟是先起火后坠落吗？

9月13日早晨5时多，中国边防检查站报告，一架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沙河机场直升机起飞后，再没有什么情况。天快亮，地面指挥所侦听到蒙古内部报告，在哪个位置看见一个发光点，发现有亮光，可能是爆炸。我马上联想到256三叉戟，位置与飞机有什么关系？李德生叫我看，时间和火光有没有关系？迫降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蒙古打下来的？指挥所议论，我们找了几个人，时间、位置这些资料都不完全，时间报来有没有误差？好多悬案，只能是可能……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256三叉戟出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这两种含义，这不是歼击机，是不是轰炸机是个问号，准备作战完全来得及。以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后来说的和情报对不上。当时有这个反映，看见一团火球，分析是我们的民航飞机。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都搞不清是什么，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雷达看不到火光。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9月13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向我报告，是不是空军有飞机起飞？我问过空军值班室，是不是我军飞机迷航？答复我军没有飞机起飞。只能估计是民航，与民航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我们核实。空军、海军都没有起飞的飞机。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是不是国内飞机迷航越境？过去有过迷航，中蒙边境紧张，是不是他们击落的？只能推测。几个小时后，总理办公室传达，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停飞，山海关机场关闭。很奇怪，更细的不知道。到中央57号文件传达，才知道林彪出事。

关于三叉戟空中起火，1997年11月23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主办）记者敖其尔报道：住在坠机现场三公里的拉哈玛大娘，最早发现256三叉戟坠毁。1971年9月13日2时，她看见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飞行，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

看来，空中起火是256三叉戟急急忙忙带油迫降的原因所在。

温都尔汗几位目击者说：先看见飞机着火，然后才坠落。

中国专家说：蒙老百姓年老眼花，把飞机上的灯误看成火了。

飞机迫降，不放起落架，前灯打不开，但可以打开机翼上的着陆灯，这是飞机上主要的大灯。飞夜航主要靠大灯，两个着陆灯相当亮，碗大的白色灯，可以把大地照得与白天一样。目击者还没有老到老眼昏花的年纪，怎么能把“灯”和“火”看成一回事？

很可能256三叉戟就是空中起火，先起火，后迫降。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